
城市、空间和同性恋

——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

魏 伟 富晓星

摘要:本文以空间-文化为主线,探讨了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文章首先将城市这一维度引入中国的同性恋研究中,呈现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的演变。第二,讨论中国20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对同性恋社群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影响。第三,比较不同城市中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强调本地文化的深刻影响。结论通过批判性反思西方的“同性恋聚居区”模式,提出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公共空间生产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城市空间 同性恋 区域差异 中国经验

同性欲望的表达和实现,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丹麦社会学家亨宁·贝克(Henning Beck)给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城市是适合同性恋者的社会世界,是他的生活空间……只要他们希望做一个同性恋,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涌入城市,融入到无边无际的陌生人之中”(Beck, 1997:98)。在贝克看来,只有在城市生活中,现代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关系实践和身份认同才能够出现和发展。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欧美国家同性恋平权运动的高涨,作为这个运动主要根据地的同性恋聚居区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明显。这引发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城市中的同性恋社群的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不仅涌现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而且试图进行相关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本文以空间-文化为主线,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位作者分别在成都(2004-2006年)、沈阳(2007-2009年)和上海(2008年至今)进行的实地研究,涵盖对每个城市的男同性恋社群的历史、地理、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方面的内容。研究方法采用的都市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历史文献分析。成都和沈阳的研究,是研究者藉由当地男同性恋艾滋病防治教育草根组织的志愿者身份,进入同性恋群体的生活圈,积极参与他们的同伴教育、外展、专题会议、文艺演出等工作和活动,从而使研究者有机会接触不同年龄、教育和职业背景的社群人士,从中选择和确定人选进行深入的个人生活史访谈。上海是本文第一作者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研究者本人对上海同志社区日常生活和重要社区活动的观察和参与。

一、现代中国城市中同性恋公共空间的演变

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研究,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等性社会学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他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对于男同性恋群体的整体性考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同志”社区的发展,也从主体建构的角度,产生了一些来自同志社区内部的研究(童戈,2005;周丹,2009)。尽管这些研究都看到公厕、浴室、公园等城市空间对于同性恋者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意义,但是,城市和空间作为重要的分析维度,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理论视野^①。作为新一代的研究中国同性恋的学者,本文的两位作者运用都市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分别在成都和沈阳进行了博士论

^① 值得一提的是,周丹的《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以“他们的空间”为题,探讨同性恋空间。作者以王小波的小说为例,主要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讨论同性恋者遭受的空间规训和压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城市空间上。

文研究,一定意义上承接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西方同性恋研究的基于某一城市展开的同性恋社区研究的路径。与中国同性恋研究先行者不同的是,“空间”成为我们关注和运用的主要分析维度。这体现在我们各自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公开:后社会主义时期成都“酷儿”空间的生产和变迁》(魏伟,2006)和《空间、文化、表演: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富晓星,2009)为了回应同性恋城市研究局限于单个城市个案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中引入比较的视角,综合我们在不同城市开展的田野研究发现,试图在中国语境下对同性恋与城市过程的关系进行经验说明和理论阐发。

同性欲望在城市中的表达和实现,总是和特定的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在城市中同性恋群体活动的具体场所。尽管不同地方都有各具特色的说法,比如港台地区称为“鱼场”(李银河,1998),成都称为“飘场”(魏伟,2007),公园、浴室、酒吧等同性恋者聚集活动的地点在国内有一个通行的说法,那就是“点儿”。“点儿”并不局限于地理学上的意义,包含了多重的要素:第一,具有可见的物质环境,包括房间、建筑、社区、方位、景观等;第二,包含嵌入在物质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第三,受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活动系统和认知图式的影响,进行空间分层;第四,空间的意义充满不确定性,取决于不同行动主体的建构;第五,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点儿”上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同性恋群体行为、价值和交往模式产生影响(富晓星,2012)。对于“点儿”的研究,是在中国探讨城市与同性恋两者关系的基本切入点。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往往都位于人口数量多、密度大和流动频繁的城市中心地带,是城市性(urbanism)最为突出和发展的空间。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为背负社会污名的同性恋者提供了必要的匿名性和包容性;而大量聚集的人口,促进了各种亚文化的发展,同性恋者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同类,并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城市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具有大量满足公共需要的服务和娱乐设施,比如绿地、茶馆、浴室和酒吧等,为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场所。需要强调的是,在“点儿”的形成过程中,或者运用一个更为学术的表达——“酷儿”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尽管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周围环境等客观因素十分重要,不能忽视的是同性恋者建构空间意义的能动性。同性恋者经常光顾那些场所,成为那些“场所”的使用者。并且能够积极地对空间的意义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符合他们自己生活的现实。通过集体和个人策略的运用,身处其中的同性恋者有意识地“颠覆这些场所固有的异性恋中心主义,从而为同性之间性的表达和与之相关的社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Ingram et al., 1997:449)。这样一来,这些场所就被“酷儿化”,通过圈内人口耳相传而成为“点儿”。

如果加入时间的维度,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中的同性恋公共空间在过去的30年间呈现了一个清晰的历史演变轨迹。1990年代以前,无论是李银河等前辈学者的研究,还是我们研究中访谈对象的回忆,都显示那个年代同性恋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公园(往往附带公厕和绿地)、广场、面向大众的茶园、浴室和舞厅等,我们可以将这些场所称为同性恋社群的“传统性公共空间”。相比下文讨论那些新的场所,这类“空间”是同性恋圈子里最为“原汁原味”,带有非正式性和不确定性的“点儿”,必须通过“圈内人”的引导才能了解的地方。同性恋“传统性公共空间”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这些场所的进入门槛很低,要么就是免费,要么收费低廉,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第二,这些场所并非专属于同性恋者,而是和异性恋主流人群共同使用的。为了从人群中识别同类,“眼神”(gaze)的交流就成为同性恋者共同运用的符号装备,成为中外学者最为津津乐道的同性恋亚文化特征之一(Bech, 1997; Levine, 1998; 周丹,2009;富晓星 吴振,2010)。第三,和第二个特点相关,对于这类空间的大多数使用者而言,同性恋身份认同还没有确立起来,至少是不清晰的。

1990年以后,中国的各大城市见证了一类新的同性恋公共空间——包括酒吧、桑拿和会所在内的“商业性公共空间”的异军突起。这类空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必须支付一定(往往是昂贵的)费用才能够进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同性恋酒吧。同性恋酒吧的出现,固然有西方文化影响和消费主义兴起等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志”身份认同这一时期在中国同

性恋人群中的普遍确立(Chou, 2000; 魏伟, 2007)。光顾同性恋酒吧(而不是其它可能人气更加火爆, 价格更为合理的酒吧), 除了满足休闲和社交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寻找认同。“喝酒并非是为了逃避什么, 而是为了加入(对话)的需要。同性恋的社会化通常是从光顾同性恋酒吧开始的, 因此喝酒在同性恋身份形成当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Nardi, 1982:18)。和上文的传统性公共空间不同的是, 酒吧、桑拿和会所这类同性恋商业性公共空间成为同性恋者的专属空间。身处其间, 本身就是对同性恋身份的肯定和表达。专属空间的建立, 是同性恋从行为向身份显化在空间设置上的体现, 它不仅便利了同性娱乐和交往, 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同性恋群体建构群体认同。

由于艾滋病的威胁日益严峻, 特别影响到作为主要高危人群的男同性恋者, 中国政府在进入新的世纪以后, 调整了应对艾滋病蔓延的社会政策, 采用了立足社区的疾病干预模式。在国际“防艾”资金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同性恋民间草根组织在各个城市纷纷建立。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初衷, 主要是协助政府在同性恋社群内部开展艾滋病的预防和教育。但是其中的一些组织, 也顺带把反对社会歧视、促进同性恋权益的议题带入了组织的行动纲领中, 从而拓展了同性恋“政治性公共空间”(魏伟, 2006; Hilderbrant, 2012)。同性恋民间组织早期的工作重点是顺应政府的“防艾”需要, 配合媒体报道, 增加同性恋的社会可见度, 提升社会对于这个人群的认识。近年来, 这些组织开始突破艾滋病的行动框架, 更加直接地提出同性恋社群的权益诉求, 策划了一系列引发公众关注的媒体事件, 比如北京数家男女同志组织在每年西方情人节(二月十四日)共同组织的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开活动, 以2009年“前门大街婚纱秀”最为轰动; 在沪的外国男女同性恋者与本地同志组织从2009年开始, 每年在上海举办“同志骄傲周”, 举办一系列论坛、艺术展、电影展映和酒吧派对等活动(魏伟, 2011)。通过同性恋民间草根组织的努力, 在经历了长期的压制和沉默之后, 同性恋社群开始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和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同性恋隔离聚居区”(gay ghetto)是西方国家描述同性恋社区的社会地理的主导模型, 它需要具备四个要素: 场所集中、文化区域、社会隔离和居住集中(Levine, 1979)。我们在成都和上海的研究发现, 除了传统的露天同性恋活动场所, 过去10年见证了大量消费性同志活动场所的出现, 包括酒吧、服饰店、健身房、美容院、桑拿和会所等满足同志人群社交和娱乐的需要, 加上同志组织的出现和发展, 进一步推进了“机构完备”的过程。同志社区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场所集中”的特点, 在成都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的东门附近, 而上海则集中在以前的法租界区域。但是“同性恋聚居区”模型的其它三条标准却并不适用。李维讲到的“文化区域”表现为同性恋人群及其文化特征的高度集中, 成都和上海的这一区域的绝大多数的居民和行人并不是同志, 而且同志活动只是在夜间和周末比较频繁。场景中不乏同志俚语和同志时尚, 但通常只有“圈内人”能够捕捉到这样的文化符号。尽管拥有“同志场所”的声名, 没有一家这样的场所会声称自己是专为同志服务的。两个城市的同志也没有出现“居住集中”的现象, 而是散居于城市里, 他们光顾这一区域主要是出于社交的需要。同性恋聚居区的出现, 除了中产阶级向郊区搬迁导致的中心城区空心化的因素, 和对同性恋的宗教和法律迫害以及城市里居住区的种族和阶级隔离不无关系, 这些都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一个历史和文化上对于同性恋相对容忍的中国社会里, 不能形成同性恋隔离聚居区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同志场所和机构的相对集中和完善还是为一个“想象的社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魏伟, 2012)。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对于同性恋社群的影响

(一) 城市化和同性恋公共空间的变迁

结合历史文献与个人生活史访谈, 富晓星和吴振(2010)发现沈阳城内的同性恋自发聚集场所, 是伴随着这个城市近代城市化的过程而形成的。近代沈阳城市化进程引发城市空间规划的变化, 如出现商业街、商埠地、火车站等, 同时伴随交通运输的日益通畅, 吸引着流动人口不断涌入这座东北最大的都市。城市化导致的公共空间变化关系着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 男同性恋群体就是其中

之一,他们占据了沈阳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中心以及交通枢纽,为城市空间赋予了一套独特的空间标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沈阳城市空间的拓展和相关交通、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完善,也使同性恋活动的“点儿”不断扩展。由于大都会的匿名性和多元生活方式为同性恋者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生活环境,不难理解同性恋公共空间总是和城市中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中国各地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城市开发和更新,对城市中的同性恋公共空间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总的来看,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作为传统性公共空间的“点儿”的衰落。这里面固然有互联网的兴起,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交往方式的原因(魏伟,2012),以提升空间的交换价值为主要目的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也是重要推手。社会主义时期在城市居民业余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宫,在很多城市里都是著名的“点儿”。位于成都文化宫内的茶馆及其附近的公园绿地,曾经是成都最为火爆的“飘场”^①。本文第一作者2005年在成都做研究的时候,因为城市更新导致文化宫被拆,使得很多同志转移到附近的一个街心花园和室内茶馆。当其2012年再次探寻这些地方的时候,两处“飘场”在一片拆迁景象中已经不见踪影。由于旧城改造导致“点儿”的衰落,也同样发生在沈阳(富晓星,2009)和上海(Bao, 2012)。

城市更新的另外一个影响是推动同性恋公共空间的分化。中国社会阶层的急速分化,也影响到了同性恋的社群(魏伟,2012),其中也包括空间的分层。光顾不同的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社群成员,不仅阶层地位和教育背景不同,而且具体的同性恋身份认同也存在差异。1990年代及以前,上海本地同性恋者最为活跃的活动区域是位于外滩、苏州河沿岸和汉口路构成的一个“同性恋金三角”地带,不仅圈内有名,而且也曾出现在一些纪实文学作品(张浩音,2003)。随着上海进入全方位开放,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传统的“同性恋金三角”开始衰落,出现了新的同性恋活动中心。一个位于以前法租界的核心地段,包括酒吧、餐馆、健身中心和服饰商店,主要迎合在沪外国人和白领专业人士的生活方式的需要。这些场所高度国际化,英语是通行语言,紧跟欧美同性恋酒吧的最新潮流,不仅是2009年以来举办的“上海同性恋骄傲周”的主要根据地,也是上海复兴海上繁华、重建国际大都市的最前沿。另外一个则栖身于中心城区东北部,苏州河北岸还未开发的老城区中。来来舞厅是一个地方偏僻,设备陈旧的交谊舞舞厅,每到周末的夜晚能够吸引数百名中年男同性恋者,伴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老歌翩翩起舞。5块钱的门票开销,只有上面提到的Gay吧里面一杯鸡尾酒价格的十分之一。晚上10点舞会结束,人们就涌向附近的一处灯光暗淡的街心公园,身处已婚老男人、下层市民、“外地人”和“MB”的世界中,大声说笑,打情骂俏,寻找可能的性的际遇。一个城市的同性恋社群的阶层、代际、地域差异,既体现为空间的分异,又使空间分异进一步放大。

(二)住房商品化和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实现

住房市场的商品化和私有化,是过去30年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上,中国同性恋社群和城市化进程也发生了关系。在经济改革以前,中国城市的一大特征就是住房紧缺。另外,国家只为已婚夫妻分配住房。没有自己的住房,也就没有了住房可以提供和保障的个人隐私,这对同性恋者尤其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制约。城市中这一时期“点儿”的兴盛与同性恋者的居住状况不无关系,来自异性恋家庭成员和邻居无所不在的注视,使同性恋者在自己的家中很难保有个人的隐私,更加不要奢谈性的愉悦和满足。与此相对,虽然是公共空间,城市中“点儿”上所普遍遵循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却意外地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个人隐私的保障。

乔治·常希(George Chauncey)关于纽约早年同性恋社会生活的经典研究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单身汉住房”(bachelor housing),表明独立的居所对于构建一个城市男同性恋生活世界的关键意义(Chauncey, 1994)。另外一项研究分析了20世纪初期多伦多的各种涉及同性恋的历史案卷,发现那个年代活跃的男同性恋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依靠工薪收入,在城市中心区域单独租房居住(Maynard, 2004)。我们在各地的访谈对象,都非常强调保障隐私的居住安排对于同性恋者

^① “飘场”是成都本地对于同性恋活动的“点儿”的叫法。

的重要性——无论拥有自有住房,还是独立租住,可以摆脱家人的控制和单位的监督,不受打扰地享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此外,一旦有了稳定的伴侣关系,组建同性家庭,独立的住房更是必不可少(魏伟、蔡思庆,2012)。虽然同性伴侣关系得不到婚姻法的承认,但一起买房供房开始成为越来越多大城市中同性伴侣彼此关系蓝图上的重要部分,通过共有住房产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建构一个事实上的家庭形态。

(三)城市新移民和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确立

中国城市化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的过程,其中可以引入性别,包括同性恋者建立身份认同,追求性的表达自由的分析维度。相比美国二战以后发生的同性恋“大迁移”主要是由于同性恋者逃离家乡保守的氛围,服务经济的兴起为同性恋者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的因素(Weston,1995),中国的同性恋移民则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社会整体城市化的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南方的那些新兴的都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除了工作机会,也包括更多的性自由(Altman,2002)。《纽约时报》就曾报道估计有15万男同性恋者生活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里。远离家乡亲人的约束和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同性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向往的生活方式,并建立同性恋的身份认同。^①魏伟在成都就遇到一对在广东打工相识相爱的“同志”,后来一起回到四川农村老家生活和创业^②。他在上海的研究也显示,在这样一座市场制度普遍确立,经济呈现高度自由化的都市中,生活在其中的同志——尤其是那些移民到上海的“新上海人”们,相比上海本地的受访者,更多地感受到个人生活的自主性,也建立起了更加积极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魏伟,2008)。

性的交易是中国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遭受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影响的重要后果之一。在圈内被称为 Money Boy(简称 MB)的男男性工作者,也是与同性恋相关的移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都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和其他移民一样向往城市生活,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和面临的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因而选择这一特殊行业。他们的工作地点也从早期在城市“点儿”上的散兵游勇,发展到驻足于专业化经营的酒吧、桑拿和会所等同性恋商业性场所。男性性服务者、娱乐场所老板和客人作为重要的“三足”,构成这一特殊的城市性产业网络(魏伟,2009;富晓星等,2012)。和一般的“同志”相比,男性性工作者的身份认同更加复杂和多元,受到移民进程中遭遇的阶层、城乡、性别和性的表达方式等诸多社会差异的共同型塑。他们以身体作为资本,力图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城市公民身份以及相匹配的经济收入。除了传统移民文献中强调的经济因素,男男性工作情境还包括性的愉悦、自我身份的探索和肯定以及现代性/都市性的实现等多重的维度,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同性恋社群空间中出现的—种新形式的性身份(Kong,2010)。

三、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中国城市/区域之间的差异

在以当代华人社会的同性恋社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两部重要英文著作中,也都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周华山考察在三个不同华人社会中——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同志”身份的建构和“同志”政治的差异(Chou,2000);江绍祺则探讨了华人男同性恋欲望和身份的表达在全球化和本地政治和文化力量共同作用之下的不同状态,展开比较的场域则是香港、中国大陆和伦敦的海外华人社区(Kong,2010)。两个研究中的中国大陆都被预设为具有政治和文化同质性的整体,但是中国大陆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内部区域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性恋公共空间被打上了深刻的本地印记。我们接下来引入城市/区域视角,关注不同城市的具体的社会

^① “Gays in China Step Out, With One Foot in Closet”, Elizabeth Rosenthal, New York Times, 2002年4月12日。

^② 关于这对农村“同志”伴侣的报道,参见雷刚,《爱白四川地震灾区救援—重建项目系列报道:什邡的同志们》,爱白网(<http://www.aibai.cn/infoview.php?id=18466>)。

语境对所在城市的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发生的影响。

(一) 同性恋社会空间的地域文化标记

魏伟在成都的许多研究参与者都声称成都是中国对同志最友好的城市之一,其它城市的同志也非常羡慕成都同志所享有的自由和空间。尽管中国文化一般而言对同性恋相对容忍,但成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更增强这样的容忍度。地处天府之国的中心,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和消费城市的历史传统,共同造就了成都以快乐为中心的本地文化和伦理氛围。成都是“休闲之城”,注重对于享乐的追求,自古就有“蜀人好娱”和“少不入川”的说法。访谈对象尤其强调的一点就是城市文化对于个人愉悦的推崇,正如一位访谈对象做的如下阐释:“这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城市。本地居民忙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追求自己的快乐,对别人的事情不甚关心。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快乐”(魏伟,2006)。追求个人愉悦在本地文化中滋生了一种自由化的伦理,从而发展出了对于同性恋更加宽松的环境^①

和成都的享乐文化一样,沈阳历史上形成的边疆文化,以另外一种方式支撑了同性恋社会空间的形成。根据富晓星(2009)的研究,由于长期受到少数民族游牧渔猎文化的影响,直到清代才有关内移民大量涌入,致使东北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较浅。此外,边疆文化的影响使东北人重感性轻理性,缺乏秩序和规范的约束意识,从而在性的问题上表现为没有强烈的等级和束缚观念,并很少将其与对快感的道德反思对应起来。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氛下,建构了一种狂放而不受束缚的男性气质,处事率性,举止粗犷,表达直露。发生的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要的就是性的满足和宣泄,而不太理会传统的性别和性的规范。这样的一种男性气质高度张扬的文化,在同性恋社群内部也助长了性别角色的分化,一方面是“东北大爷们”的刻板印象的普遍确立,另一方面则催生了深具群众基础的“反串”文化。

在关于城市的文化想象中,上海一直是一个极度性别化和性化的城市,并和这个城市作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密切相关。20世纪上半期,蜂拥而至的殖民者、游客、文人、革命家、投机客、娼妓等各色人等,为上海营造了一个浓重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氛围,并使这个城市变得极度性感(李欧梵,2001;贺萧,2003)。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前期的短暂中断之后,1990年代后全方位开放的上海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作为“世界主义”重要体现(Bell and Binnie, 2004)之一的同性恋文化空间,也在这个城市中发展起来。今天的上海拥有中国大陆最为炫目的同性恋夜生活,场所众多,紧跟潮流。上海的同性恋公共空间一方面是高度国际化的,身处其间的中外“同志”都抱有对于“世界主义”的积极参与和充分想象;另一方面,相比中国其它大都市,上海的“同志”世界的突出特点是消费主义推动,生活方式主导,而对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并不热衷(魏伟,2011; Bao, 2012)。

(二) 日常生活和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

研究城市空间和同性恋表达之间的互动,需要突破西方主要大城市中同性恋聚居区的认识框架,认识在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中的日常空间(ordinary spaces)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Brown, 2008)。同性恋者在城市中的活动和交往场所,比如公厕、浴室、酒吧、广场、公园等,在不同城市中都有体现。有趣的是,有些同性恋公共空间,却是深深扎根在本地文化中,并由此获得一种特殊的社会合法性。体验成都的休闲氛围,最好的去处就是茶馆。绝非巧合,成都本地最具特色的同性恋公共空间形成在茶馆里。到茶馆喝茶是成都本地最引以为豪的重要的民俗之一,了解茶馆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对于理解成都的社会非常有帮助(王笛,2006)。作为社会空间和休闲场所的

^① 在探讨为何旧金山发展为同性恋聚集的大都会,卡斯特强调独特的本地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旧金山很早以来就是一个追求个人自由少有道德约束的地方,为日后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同性恋亚文化的显著特征包括“享受生活的愿望和能力,性的压迫激发出创造性,和通过强调其荒谬的一面去颠覆现有的价值观念”(参见 Manuel Castells,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 - 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成都茶馆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别是民众在茶馆里面享有相当的自由,本地的官府少有干涉。和其他本地居民一样,成都的男同志也喜欢到茶馆喝茶和见朋友,只不过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处,包括成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文殊院里的一处。成都茶馆里的同性恋公共空间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同志在茶馆里没有躲躲藏藏,而是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有意识的圈内俚语的运用,或者明显的性别表演,茶馆的特定区域被“怪异化”(queered)。既然茶馆属于公共空间,同志成群结队,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这个场所,某种程度上,他们算是自我“公开”了。第二,尽管同志一般聚集在茶馆里的特定区域,茶馆里的同志空间和社会大众是整合在一起的。周围坐着其他的茶客,同志对于自己的身份很坦然。由于同性恋者的欲望、行为和交流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时常经历内心和社会性上的“异化”(Ingram et al., 1997)。同志在茶馆的集体出现,不必隐蔽自己,从而突破了导致“异化”的心理怪圈。同志对公共空间的要求,在茶馆里得到了其他茶客的认可,坐在普通人中间,同志们不再觉得自己“异常”了。许多访谈对象认为成都对同性恋特别包容,是形成以茶馆为代表的大众和同志和睦共处的公共空间的重要原因。

同性身份和欲望在沈阳则在另外一种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公共空间中得到了表达。在城市广场表演秧歌是东北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形式,并且盛行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达到增强喜庆效果的目的。富晓星(2009)在沈阳的研究对象中不少都是戏曲秧歌队的活跃分子。秧歌表演中的反串传统,可以上溯到解放以前。民间艺人定期在北市场露天演出秧歌。如有商家开业庆典,更是喜欢邀请秧歌艺人去表演助兴。在这些老艺人中,很多有名的扮演女角的都是圈中人。虽然优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同性恋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在舟,2001; Wu, 2002),但秧歌中反串演出,作为一种超越日常性别规范的实践,似乎在东北有着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异性恋为主的迪吧中,部分同性恋者仍然热衷于将表演的空间扩展至异性恋群体的舞台上,男扮女装进行时装秀、革命舞蹈和小品的表演,配以煽情的话语,将娱乐气氛推至最高潮。眼尖的观众可以识别出男性扮演女性,却未必知道这是以同性为喜好的另一群体的公开表演。在这个特定空间中,同性恋群体以一种谐谑性的剧本改编和表演实践表达了他们自身也许都未意识到的、对于主流异性恋文化的非正式反抗(富晓星,2012)。

舞厅是一个舶来物,作为某种现代性的标记,在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首先传到上海这个中国最摩登的城市。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舞厅跳舞在上海各个阶层的人士中变得非常流行。即便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单位和工会还经常组织舞会。由于被指责带有“资产阶级”习气,舞厅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上海被禁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共舞会才得以恢复,工厂、大学、街道和文化场所都纷纷开设了舞厅(Farrer, 2002)。20世纪90年代以后,年轻人被吸引到酒吧和迪厅等更加时尚的娱乐场所,那些青春不再,但曾经“摩登”的中老年人士仍然钟情于到舞厅跳舞。交谊舞的两个舞伴,通常是一男一女。然而社会主义时期前30年的“禁欲主义”氛围对男女界限的严格监控,使得两个舞伴同一性别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为同性欲望的公开展示和表达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暧昧空间。因此,周末夜晚“来来舞厅”数百名中年男人相拥而舞,并没有引起街坊的震惊和官方的干预。事实上,“来来舞厅”平时是男女跳舞,到了周末人气最旺的时候则成为男男专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中,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概念来定义或者区分这个舞厅不同时期的性质似乎并不合适,但是同性恋公共空间却被名正言顺地生产出来,并且顽强地存续了下来。

四、讨论

在与成都和广州的同志组织积极分子的交流中,他们谈到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城市里建立同志自己的“实体社区”的设想。近年来,随着信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特别是每年6月西方城市举行的大规模同性恋游行的相关报道,使得中国的同志对于这些城市中的同性恋聚居区有了更多直接或者间接的了解。同志建设“实体社区”的设想,无疑是受到对西方同性恋聚居区的认知和想象的影响。同性恋聚居区不仅从空间上为同性恋社区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在196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身

份政治的形成和动员,争取同性恋平等权益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D'Emilio, 1988)。但是,同性恋社区的历史研究也揭示同性恋聚居区是欧美(特别是美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的产物,本身也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在不断变化。由于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早期形成的同性恋者空间聚集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此外,同性恋聚居区本身在同性恋内部引发新的争议。西方城市著名的同性恋街区纷纷成为所在城市进行地方营销、开发旅游业、利用族群差异营造“世界主义”氛围的新自由主义城市复兴计划的重要部分。由于这一过程导致对一些更加弱势的性少数群体的社会和空间排斥,削弱了同性恋聚居区早年具有的肯定集体身份和进行政治抵抗的意义(Bell and Binnie, 2004)。酷儿理论影响下的学者也批判同性恋聚居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的强化,不仅不利于整个社群的根本解放,而且也在助长和抹杀社群内部其它社会差异的“同性恋正统性”(homonormativity)(Duggan, 2002)。这些都提醒我们需要反思西方的同性恋聚居区模式在中国适用的问题,不但存在社会语境的错位,而且在推进同性恋平权政治方面也具有盲点。正是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本文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城市、空间和同性恋的关系,重点强调了本地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对于生产同性恋公共空间的意义。这些不同的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的一个共性超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元分离,以其特有的暧昧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容纳了同性恋欲望和身份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和主流社会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鉴于现有同性恋研究中对于中国大陆的整体性预设,本文尝试运用城市/区域的视角,关于不同城市特有的本地文化是如何形塑当地同性恋公共空间的实际形态和生产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并非以一种基要主义(essentialist)的观点看待本地文化;相反,我们强调文化是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过程共同建构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引入城市/区域的视角,对推动当代中国的同志平权运动有何意义?已有学者注意到,由于政策环境导致的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了中国不同城市的同志社群的组织和动员(Hilderbrandt, 2012)。除此之外,本地文化——尤其是体现在茶馆、广场、舞厅、酒吧等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市民文化,是否也在其中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我们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期待更加深入细致,运用比较视角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对此有所回应。超出同性恋议题本身,我们提出了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城市独特的市民文化,对于这个城市的市民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有何意义?这才是我们这个研究更为根本的着眼点。

参考文献:

- 富晓星,2009,《空间、文化、表演——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 ,2012,《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开放时代》第4期。
- 富晓星、吴振,2010,《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工程研究》第1期。
- 富晓星、Lei Zhang, Eric. Chow, 马铁成,2012,《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人口研究》第4期。
- 贺萧,200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欧梵,2001,《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银河,1998,《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 弗洛朗斯·塔玛涅,2009,《欧洲同性恋史》,周莽译,商务印书馆。
- 童戈,2005,《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 王笛,2006,《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魏伟,2006,Going Public: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eer Spaces in Post-socialist Chengdu, China. 《公开——后社会主义时期成都“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变迁》,洛约拉(芝加哥)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博士论文。
- ,2007,《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社会》第1期。
- ,2008,《当代上海同志权益意识和生存经历调查》,未发表研究报告。
- ,2009,《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社会》第4期。
- ,2011,《“酷儿”视角下的城市性和空间政治》,《人文地理》第1期。

- ,2012,《想象的社区——当代中国都会“同志”圈子的民族志研究》,《中国城市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
- 魏伟,蔡思庆,2012,《探索新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关于成都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的研究》,《社会》第6期。
- 张浩音,2003,《上海往事》,广西人民出版社。
- 张在舟,2001,《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 周丹,2009,《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Altman, Dennis 2002, *Global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o, Hongwei 2012, “Queering/Querying Cosmopolitanism: Queer Spaces in Shanghai”, *Culture Unbound*. Vol. 4.
- Beck, Henning 1997, *When Men Meet: Homosexuality and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ll, David. and Jon Binnie 2004, “Authenticating Queer Space: Citizenship, Urbanism and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Vol.41 (9).
- Brown, Gavin 2008, “Urban (Homo)sexualities: Ordinary Cities and Ordinary Sexualities”, *Geography Compass*. Vol. 2 (4).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 – 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uncey, George 1994,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 – 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 Chou, Wah – shan 2000,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 – 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Haworth.
- D’ Emilio, John 1988,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 1970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ggan, Lisa 2002, “The New Homonormativity: The Sexual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In: Castronovo, Russ. and Nelson, Dana D. (eds) *Materialising Democracy: Towards a Revitalized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arrer, James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lderbrandt, Timothy 2012,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The Effect of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Local Politics on LGBT Activ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77).
- Ingram, Gordon. B., Bouthillette, Anne – Marie. and Yolanda Retter 1997, *Queers in Space: Communities, Public Places, Sites of Resistance*. Seattle, WA: Bay Press.
- Kong, Travis 2010,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London: Routledge.
- Levine, Martin 1979, “Gay Ghetto”,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4 (4).
- Levine, Martin 1998, *Gay Macho: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Homosexual Clon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anuel Castells,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A Cross – 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ee.
- Maynard, Steven 2004, “ ‘ Without Working?’ : Capitalism, Urban Culture, and Gay Hist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30 (3).
- Nardi, Peter. 1982, “Alcoholism and Homosexuali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7 (4).
- Weston, Kath 1995, “Get Thee to a Big City: Sexual Imaginary and the Great Gay Migration”, *CLQ: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2 (3).
- Wu, Cuncun 2004, *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责任编辑:吕 鹏